

骈文与类书之关系论略

东方乔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81)

摘要:《皇览》产生于1700年前的曹魏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类书。此后,类书的编纂,无论官修与私刻,卷帙难以计数,贯穿于魏晋直至明清千百年间。究其原因,骈赋催生了类书,类书孵化了骈赋。六朝以降,骈文独立成体,类书一如雨后春笋,冒地而出,蔚为大观。类书之所以为类书,其为骈赋、诗文的创作,提供了新词丽句、奇字僻典、历史掌故、天文地理等素材。同时对于骈文的独立发展、成熟及全盛,起到了涵养文化底蕴、提升文学功用、淬炼文人气质的作用。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轻忽类书,而骈文的研究与类书之关系尤为重要。

关键词: 骈文;类书;价值;论略

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1-0056-08

类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是,现当代的学术研究,除了在目录文献学中论及外,中国文学史一般都忽略不提;大学教育,除了文献学专业外,本科生课程一般也鲜有涉及。似乎类书与古代文学无关。可见,类书被冷落在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了。类书在古代文学中是否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能否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或深思。

类书的创世至今已有1700多年了,因辞赋而生,因骈文而盛,因白话文而微,因骈赋消歇而亡。类书创世早,且历史悠久,部帙之大,数量之多,作家之众,内容之广,容量之博,涵蓄之富,是任何文献门类所不及。尤其是六朝以后,骈文横绝一世,凌轹百代,类书与骈文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说骈赋催生了类书,类书孵化了骈文。因而骈文的研究不能绕开类书,类书对于骈文的发展、成熟及全盛,至少在以下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语言学,如辞藻、典故、字韵、声律、平仄、对偶等;一是文献学,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

中国古代骈文的研究,前辈与时贤诸学者都

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卓具思辨的论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给我们在骈文研究方面的一些启迪。比如骈文与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基于此,本文旨在从骈文与类书的关系着眼,企求寻绎出以下问题:一是类书的产生及其文化背景;二是六朝以后骈体文的繁荣,是否依赖于类书而“獭祭”“烺烺”撷拾成文的;三是类书之于骈文创作具有的适用功能及其文化价值。

—

什么样子的书才是类书呢?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子部·类书类·小序》有云:

类书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玃断壁,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①

纪昀《四库提要》的定义及解释值得注意,类书的特点在于“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这显然是

收稿日期:2017-07-20

作者简介:东方乔,男,河北邢台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69页。

指类书的体制体例而言,意即包举万物,体量驳杂。正因如此,“四部之内,无所可归”,才标举而产生了一种新的书目门类,故曰:“类书”。反之,就历代类书之体制而言,其涵盖的内容恰恰是“有经有史,有子有集”,新词丽句、奇字僻典、历史掌故、天文地理,无不赅备,类书的体性面目由此可见。

然而,士人为文、辞赋家的创作都十分需要“类书”,目的在于丛脞词汇,以便于翻检,而“类书”就得以适时应运而生。当然,类书的创生与编纂,突破了知识唯少数人享有、典籍为官方所垄断的局面,真正成为天下文人士子普遍共享的文化资源。

中国久有崇诗文,重撰述、结集修书、述往事、思来者之风尚。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以至文人学者家家有制述,人人有结集。上乘者藏之名山,平庸者聊叙情志。尤其是两汉,对于整飭史迹,撰录图书,收藏典籍,俨然提升为一种国家大事,官方行为。

顾炎武《日知录·秘书国史》条云:“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歆谓:‘外则有太常、太子、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绌石室金匱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班固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订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①我们知道,两汉时期,更是辞赋炽烈,骈文结珠,文学创作最为繁盛时期,同时,也是辞赋家群体形成的一个阶段。书籍对于一般文人学者而言,由于书写材料及印刷术的困难,要想博见洽闻、辞藻丰采,国家馆藏之典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问题是天下读书人,很少有几个能有幸饱览国家馆藏之典籍。

司马迁在《史论·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②又《汉书·艺文志》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败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③

汉代是一个对于原有的全体文化整合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文化创意而勇于创新的时代,同时更是开辟了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汉赋就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赋体文学在汉代定型完备,风格多样,笼罩汉魏四百多年。汉代赋家,上自皇帝,下至一般文士,作赋摘才,逞气使能,完全成为文化阶层、士人群体的整体行为。作赋名家辈出,不但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样的大家,还涌现出众多的著名赋家,如贾谊、枚乘、刘歆、蔡邕、王粲等,都有名篇传世。辞品赋风之影响,直至魏晋南北朝。丘悦《三国典略》载:“齐魏收以温子升、邢邵不作赋,乃云‘会须作赋,始成人才。唯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④鍾嵘在《诗品·序》云:“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⑤时人鲜见吟诗而勇于骈赋,并且以能否作赋作为权衡人才的唯一标准,着实概括了赋体在两汉的地位及影响。汉赋的繁荣,对于作家而言,更加渴望具有丛脞词汇,开拓视野,便于翻检的创作资源。类书的创世与产生,显然是由当时的文化背景、辞赋创作的态势所驱动的。

① 顾炎武:《日知录集解》,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②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④ 《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45页。

⑤ 鍾嵘:《诗品·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汉魏鼎革,文风丕变。当历史的脚步迈进魏晋南北朝时期,赋家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物色关照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赋体文学方面引起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差异,从而赋作赋品也呈现出与汉赋不同的风貌及品味。与其说骈赋与散赋同时产生,并行不悖于西汉的话,直到东汉末,迄于魏晋,她无疑经历了发轫期、转变期、形成期、全盛期等几个阶段。

骈赋成熟、发达于魏晋,决不是偶然的。历史上父子宰相、父子翰林、父子诗人、父子文豪并不少见,如王谢之族,三苏之家,但是像“三曹”父子那样,既是诗人、辞人,又是文坛领袖,倾心文事,笼罩千载,在文化史上实属罕见仅有。那么类书的出现,是否与曹魏父子的倡导有直接关系呢?

《三国志·魏书》本纪注引《魏书》云:“(曹操)是以册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曹操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然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身边,招纳而集中了一个具有当时最高文学水平的文人集团。曹植《与杨德祖书》云: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②

建安元年,对曹操而言,其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加之其广泛搜罗人才,可以得见曹操重文士、重名士的文化策略,吸纳人才为我所用,反映了曹操思贤用人的一贯倾向。王粲言曹操:“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③明胡应麟亦云:“朝携壮士,夜接词人。”^④

曹操对“文士”“名士”的征召罗网,不同于以往帝王的“俳优蓄之,”这些文士实际上都是曹操

政治设计、文化建构、成就争霸大业的一支重要的主体力量,同时也表明,文人及其文学的地位,得到了未曾有过的独立和历史性的突破。“建安文学”“建安风骨”“建安文人气象”,正是人得其才、才为我用的结果。

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盛世,一代文学亦有一代文学之文事。研究魏晋文学,不能轻忽曹氏父子;研究类书《皇览》的创生,同样不能绕过曹氏父子。

锺嵘《诗品·序》有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⑤又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裁英逸,故俊才云蒸……”^⑥上述评论至为公允,曹氏父子三人各有所长,并聘其才。尤其是曹氏兄弟更是一时并选,难分伯仲。

毫无疑问,曹丕代汉伊始之黄初元年,便诏修《皇览》,已然成为可能。除了他们父子本身的文学成就以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措施,从思想上、理论上、文学储备、文籍体例、人才吸纳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且有独到的见解与创获。类书《皇览》的撰著,不是偶然的。

曹丕是学者,是才子,是帝王,他的一生最大的文化成就,就是诏命王象、桓范、韦诞、刘邵、缪袭等人,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费数年之功,举全国之力,编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且具有八百余万言的类书《皇览》。类书,以一种新的书类面目而问世,因此,魏文帝曹丕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如《三国志·魏·文帝纪》:“……初,帝好文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诸书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页。

② 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曹植传》注引《典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8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8页。

④ 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⑤ 锺嵘:《诗品序》,第12页。

⑥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37页。

皆有记载。

《皇览》既是类书之祖,类书创生对后世文事有什么作用,在中国古代典籍史、文化史上又有什么影响呢?对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云:“《魏志》称魏文帝命王象、刘邵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注引《世语》称其书撰集数载始成。‘合四十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是诚空前创作,极便来学。宜乎后世仿例踵成,屡见不鲜也。如唐太宗之辑《文思类要》,周则天帝之辑《三教珠英》,宋太宗之辑《太平御览》,……量愈出而愈多,类愈分而愈精,乃至分部数百,编卷愈万。虽内容之精有逊于现代《大英百科全书》,然创意之早,收书之富,实足夸耀世界。”^①姚先生的论述极为准确,《皇览》的编纂方法是“以类相从”,其对后世的作用,就是供文人士子为文及创作骈赋时寻检典故、抄袭成文、剽窃辞藻之用。由于类书独有的编纂体例,兼容并包的体制容量,寻检便捷的实用功能,尤其为文人士子所称道。此后六朝人循古抑扬,沿革会时,编纂类书蔚然成风,势必与其特有的功用相攸关。

二

前引纪晓岚所谓“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所谓“检寻”,就是采撷辞藻;所谓“剽窃”,就是重拾故实,为我所用。都是为文人士子提供雅言丽典、资料素材,以资撰著之用。前引姚名达所论,也是为作家采撷辞藻,重拾故实的意思。所谓“宜乎后世仿例踵成”,是指后人视《皇览》为典范而纵情摹仿,自此类书风行于世。隋唐以后,不但官修之类书充塞秘阁,即书坊私刻之《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翰苑新书》《兔园册》亦复层出不穷。士子文人命笔为文,离开类书便神昏意乱,吮笔目痴,不能下一语,作一言。这种情形到了明、清两代,文人学士亦不免久困于“兔园册子”之下者,更非少数。江藩云:“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

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哉,然皆滞于所习,以求富贵,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也。”^②类书为文人士子为文提供了词汇典故,意在方便简省,而历代文人士子反为类书所累,困守于藩篱之中而不能自拔,丧失了清新活泼的创新意识,这为江藩所极为鄙视的。当然,这是类书之过,还是人之自误呢?恐怕这也是类书编撰者们所不曾预料到的。

岂仅“有明三百年”如此,有清二百七十年又何尝不如此?清代康熙皇帝曾御制巨型类书《渊鉴类函》行世。《四库总目》云:

我圣祖仁皇帝特命儒臣因(俞)安期所编(注:《唐类函》),广其条例,博采元明以前文章事迹,胪纲列目,荟为一编,务使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源流本末一一灿然。计其卷数,虽仅及《太平御览》之半,然《御览》以数页为一卷,此则篇帙既繁,兼以密行细字,计其所载,实倍于《御览》。盖自有类书以来,如百川之归巨海,九金之萃鸿钧矣。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亘古所无之巨制,不数宋之四大书也。^③

可见,《渊鉴类函》眼界高远,容量宏大,自先秦至元明,凡曰类文、类事、类韵、类聚者,无不赅备。究其渊源,毫无疑问也是以《皇览》为滥觞的。

从类书史看,《皇览》其下历代帝王大都推重类书,大凡巨制之作,都是出自“敕修”“御制”。如:《华文遍略》梁武帝命徐勉等人撰;《文思博要》唐太宗敕修;《太平御览》宋太宗敕修;《册府元龟》宋真宗敕修;《古今图书集成》清世宗敕修;

这只不过是撮其荦荦大体者而言,其他数百卷,或数十卷的类书,难以指算。这些“敕修”者虽然都是帝王,却也都是“翰林天子”,本身具有推播文化、制述艺文、沾溉学术的文人学者气象。由于他们的推重,历代多少文人染指于类书之制述,私修坊刻纵横千年,无可算计。可见,总结文化,整饬典要,繁荣文事,鉴古出新,是历代有为之帝王敕修类书的基本动因,这与曹魏撰制《皇览》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论·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③ 《四库总目·类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94页。

之初心并无二致。

研究类书与骈文之关系,有一部书不能不讨论,即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的《昭明文选》。

潘耒《日知录序》云:“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①所谓的“通儒之学”,概以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代表;至于“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俗儒”之学,或可以杜嗣先的《兔园册》、白居易的《六帖》、李商隐的《金钥》为代表。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下云:“白乐天《六帖》为应科举而设,故丑类不广,梁《昭明文选》,亦咸为辞赋栋料。”^②所谓“辞赋栋料”,是指《文选》蕴藏着丰富的新词丽句,奇字僻典,是供作骈缀赋者拣择的“栋料”。就“通儒”的眼光来看,正如锺嵘《诗品》所云:“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③锺嵘所谓“文章”,就是指齐梁时期风靡朝野的骈体文而言。类书,成为供养文人用典使事的渊薮,丰富的词汇,深隐的典故,华美的丽句,广博的素材,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不仅形成了作家独有的文风,甚至还直接影响不同时代的士风。

南朝以迄隋唐,无论是官修御制,还是私纂手辑,骈赋作家无不以类书为创作之武库。遗憾的是,创作者一味地追摹华丽,强求典雅,滥用典故,轻薄浮夸,致使徒有虚文,或有无病呻吟之嫌,创作风气大坏。隋唐学者对于六朝骈文的指摘,莫不针对于此,不为未见。

史以《昭明文选》为文章之总集。如《隋书经籍志》即将其列入“总集”门中,且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

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④之后各代志传皆遵《隋书》之例,包括《四库总目》皆将《昭明文选》列在集部“总集类”中。

《昭明文选》是“总集”类,还是应该视之为类书呢?这需要对《文选》采取的分类方法重新审视。《文选·序》尾句云:“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⑤

所谓“次文之体”,指的是编撰体制、体例;所谓“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之“类”,显然是受到《皇览》《文章流别》等类书门目的影响。人多荒疏,终有醒者。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慧眼独具,则直接将《文选》《文章流别》视作类书加以考论。

《类聚序》云:“夫九流百氏,为说不同;延阁石渠,架藏繁积。周流极源,颇难寻究;披索贯,日用宏多。卒欲摘其菁华,采其旨要,事同游海,义等观天。……‘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抒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列文于后;俾夫览者以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古今,宪章坟典云尔。”^⑥这篇序言,内容极为丰富,颇有见地的是将类书直接判为“专取其文”或“直书其事”者。据此,《文选》当属类书无疑。

从目录学史上看,《皇览》以下,六朝人热衷于“类书”的编撰,已然成风,遗憾的是,大多亡佚而不传于后世。为什么独有《文选》逾古于今呢?其一或是由于《文选》部类纯粹,只限于文章,卷帙较少,最为适合文士创作时的“獭祭”之用。尤其是隋唐以来,开科取士,专门试之以诗赋,而《文选》则成为吟诗作赋的文章宝典;其二《文选》只限于文学,大凡经、史、子部内容一例不收。这在萧统《文选序》中表达的殊为清楚:

①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7页。

② 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下,新北:广文书局1968年版,第50页。

③ 锺嵘:《诗品·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④ 魏征:《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9页。

⑤ 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⑥ 欧阳询:《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邱,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牘,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①

唐宋以降,无论私馆公学,《文选》俨然成为最受欢迎、最为普及的百科全书。尤其是科举士子、抑或风骚文人,大凡摹仿研习四六骈体文者,几乎人手一册,是当然的案头必备之典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②

《文选》已然成为唐宋科举的百科全书了。然而,《文选》自先秦至齐、梁,共收录了一百二十七家的诗文、辞赋,辑为三十卷,可谓蔚为大观。士子若把这皇皇巨著读得“烂熟”,又谈何容易?为了士子的伏读之苦,翻检之劳,宋代的刘攽,遂精编《文选类林》十八卷;苏易简再编了《文选双字类要》三卷;明代的凌迪知又编《文选锦字》二十一卷。这正是选中又选,类又分类,将一部《文选》绌绎删节成一部“兔园册子”了。所谓以我搜辑之勤,祛人翻检之剧,目的并非止于阅读之便,而是为了创作时的“獭祭”“烎烎”汲取既往,为我之用。

文人创作四六骈体,既以高度争胜,又以深度见长,这不仅要求为文立意清新,见解不俗,更需要新词丽句、异闻僻典的点缀与支撑。曾几何时,有多少文人为安一字、为吟一句、为驱使一词,无不剜目鉅心,掏胃擢肾。标新立异,托故征今,谈何容易?而类书正好满足了文人士子的需要。这或是编撰者寄予类书的初衷,也更是文人士子孜

孜于类书,以期涵养学术、发明新知、创见文学气象的用心之所在。

三

辞赋、骈赋催生了类书的创世,类书的孵化功能使骈文成为显学。尤其是南北朝时期,骈文、骈赋已然成熟为一种独立文体,以四、六言句式为主,讲究对偶,追摹丽词,多用事典,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格局。如果仅从文学史本身来看待骈体文,或许并不能真正掌握骈体文何以生成,何以式微之规律。所以,我们不妨从类书入手,重新审视骈体文这一文学样式。

唐代以诗赋取士,烎烎成俗,獭祭成风,作骈摘赋,一直沿习齐梁文人追求的捃拾细事,争疏僻典,词不贵奇,竞须新事,或以一事不知当为耻,以字有来历则为高的风气,编撰适用便捷的类书也成为时代的要求。虞世南所编之《北堂书钞》、欧阳询之《艺文类聚》、白居易之《六帖》,都是供士子作文“獭祭”之用。这样的实用性类书,就被一些有思想、有见识的士子讥讽为“兔园册子”了。

据欧阳修:《五代史·刘岳传》载:“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刘)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消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③

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辅佐十位皇帝,始终担任宰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籍评论多有微词。欧阳修所言是否确有其事,暂不赘言。但是,《兔园册》确有其书传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曰:“《兔园册》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丽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教学童,故有‘遗下兔园册’之消。”④王应麟《困学纪闻》又说:“《兔园册》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

① 萧统:《文选》,第3页。

② 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③ 欧阳修:《五代史·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第632页。

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

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谓此也。”^①显然,“兔园册”被唐宋士子讥为俗书,专供庸人剽窃之用,后世便将《翰墨大全》《翰苑新书》之类的“恒订”“獭祭”之书,蔑称为“兔园册子”了。

世有俗人,而无俗学。至于文人与类书,正如《初学记》序言所云:“人生而不学与无生同,学而不能文,与不学同,能文而不载乎道,与无文同。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是以近世有摘六经诸子百家之言而记之,凡三十卷,开卷而上下千数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可用以骈四偶六,协律谐吕,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也。愚愿学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贯道,祈至于文王孔子之用心处而后止。毋为猎取其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绘句,以治聋俗之耳目焉。乃善学者也。”^②其意非常明白,要求士人创作骈文,不要单纯地“猎取其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绘句”,《初学记》的实际作用,在于愿学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贯道”。这是通儒与俗儒依凭类书,采辞作文的基本态度及区别。可见,骈赋催生了类书,类书滋养了骈体。齐梁之于隋唐,尤其如是。

黄侃说得更加透彻:“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黄注:汉代之文几乎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自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拮据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胜而质渐以漓,学富而才为之累,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博闻者裕之以平素,天资不充,益以彊记,彊记不足,助以抄撮,自《吕览》《淮南》之书,《虞初》百家之说,要皆探取往书,以资博识。后世《类苑》《书钞》,则输资于文士,效用于一闻,以我搜辑之勤,祛人翻检之剧,此类书所以日众也。”^③

不可否认的是,南北朝是骈体文全盛时期,以偶句为主,讲究骈偶对仗和声律,注重藻饰和用典,强调四六排比,意在追求句式的整齐和声韵的和谐,涌现出不少文笔优美,用典使事,骈而不滞

的佳作,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北山移文》、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庾信《哀江南赋》、徐陵《玉台新咏序》诸骈体,无不用典使事;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甚至公文、讼狱判词亦为骈文,如骆宾王《讨武曌文》、王勃《滕王阁序》、李商隐《虱赋》、陆龟蒙《蚕赋》、罗隐《后雪赋》、张《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白乐天集甲乙判》等,其用典使事、丽句新词,无不是拈取于各种类书。辛文房云“(李)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缚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獭祭鱼”又岂止李商隐一人?风气使之然也。由此可知,辞赋催生了类书,类书孕育了骈赋,此言不虚。所以类书对于骈体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们如何看待类书呢?对于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否还具有她本有的文化功用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今天通行的是白话文,但是,在创作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拒绝用典;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社会,也不可能割断古代文化的血脉支撑;虽然我们企图以最充实的笔调创作骈文,但是始终没有走出古代骈文的自家藩篱与门户;虽然我们尝试过以最朴质的语言创作出新骈体,但是始终不愿意披上让人厌恶的麻衣陋服。所以,华丽不是文学的病态,用典不是文学的痼疾,妩媚也不是文学的轻佻,声律更不是文学的无病呻吟,浅陋、轻贱、猥鄙、恶俗难道就是骈赋文学的体面?用典在于言此及彼,意在深刻;求声合律,意在文字之抑扬顿挫;言辞华丽,意在文学之气质高贵;俪句对偶,意在整齐典雅。只要可用、活用、适用,当用,何乐而不用!

显而易见,类书,既是集合既往文化的思想宝库,又是发明新知、开创文学新面的策源地。用之而以为难,援之而不患其所穷。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认为类书本身不具有学术意义,只是一种工具书而已,恰恰忽视了辞赋之于类书,类书之于

① 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0页。

② 徐坚:《初学记·南宋刘本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③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9页。

骈文的内在关系,认知上的错觉,学术上的误解,这或许是漠视类书,绕离类书,无意关注类书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不懂得类书,就不能够全面理解

辞赋及骈赋的发展史;或者说,不懂得类书,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llel Rhythmical Prose and Categorized Books

Dongfang Q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Survey* (《皇览》) was compiled in the Wei Period (魏) 1,700 years ago, which was the first categorized book (类书)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is, large numbers of categorized books were compiled either by the government or by private owner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ategorized books lasted from the Wei Period and the Jin Dynasty (魏晋)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it comes to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t is parallel rhythmical *Fu* (骈赋) that brought about categorized books. In turn, categorized books incubated parallel rhythmical *Fu*. Starting from the Six Dynasties (六朝), parallel rhythmical prose (骈文) became a separate genre while categorized books sprang up like mushrooms. Categorized books provided the creation of parallel rhythmical prose and *Fu* with novel expressions, beautiful sentences, peculiar words, rare allusions, historic anecdotes, astronomical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tegorized book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maturity and flourishing of parallel rhythmical prose through enriching the cultural deposits, elevating the literary function and improving the temperament.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lassical literature, categorized books cannot be neglected.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udy of parallel rhythmical prose and categorized book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Key words: parallel rhythmical prose, categorized book, value, brief discussion

(责任编辑 李 铎)